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研简报

2018 年第 1 期（总第 49 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18 年 3 月 15 日

本期要目

➤ 特别报道

我院顾丽梅教授获 2017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立项资助

我院唐亚林教授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立项资助

我院 3 项课题获得 2017 年度上海市社科立项资助

我院 1 项课题获得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我院 3 项课题获得 2017 年度“改革开放 40 周年、建国 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系列研究项目立项资助

我院 1 项课题获“面向未来 30 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 成果简介·专著(P5)

➤ 成果简介·论文(P10)

国际政治系 (P10)

政治学系 (P14)

公共行政系 (P21)

特别报道

我院顾丽梅教授获 2017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立项资助

日前，经专家严格评审，2017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已立项公布。复旦大学顾丽梅教授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创新研究》课题获得该项目立项资助。

我院唐亚林教授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立项资助

日前，经专家严格评审，2017 年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专项已立项公布，我院唐亚林教授获得该项目立项资助。

我院 3 项课题获得 2017 年度上海市社科立项资助

2017 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青年课题按照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顺利完成评审立项工作并于 9 月 18 日公示。我院有 3 项科研项目入选，具体情况如下：

课题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学科分类
2017EZZ002	环境冲突的政府回应模式及吸纳机制研究——以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为例	孙小逸	政治学
2017EZX006	上海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殖民政策及其影响研究	段世磊	哲学宗教学
2017EFX004	法治中国背景下超大城市构建法治社会的策略研究与评估设计——以北京、上海、广州为研究样本	崔涵冰	法学

我院 1 项课题获得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7 年上海市社科规划系列课题按照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等规定程序，顺利完成评审立项工作并于 8 月 18 日公示。我院有 1 项科研项目入选，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71703026	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与纳税意愿研究：基于不同税制要素设计的比较分析	张平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我院 3 项课题获得 2017 年度“改革开放 40 周年、建国 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系列研究项目立项资助

2017 年度“改革开放 40 周年、建国 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系列研究项目按照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等规定程序，顺利完成评审立项工作并于 7 月 24 日公示。我院有 3 项科研项目入选，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政党中心的治理与政治文明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	郭定平	重点项目
政治中的军队：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变奏	陈明明	一般项目
关于我党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	桑玉成	一般项目

我院 1 项课题获“面向未来 30 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2017 年我院李瑞昌教授的课题“上海全球城市管理与城市安全防护研究”获得“面向未来 30 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据悉，“面向未来 30 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起的重点课题，旨在科学分析和预测未来 30 年上海城市发展的趋势和远景，明确上海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所承担的责任，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战略目标。

► 成果简介·专著

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变迁

薄燕 合著

本书通过确立和运用一种新的、整合的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机制（变迁）的政策与行为提供一种新的描述和解释。在从“原则”和“规则”的角度分析全球气候变化机制发展和变迁的背景下，运用“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分析框架，研究了参与该项国际机制变迁的政策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本稿试图对国家合作行为和参与国际机制变迁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并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建设和中国气候外交具有政策含义。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合著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刚刚开始，在西方学术界悲观翻地介绍到中国来崭露头角的时候，虽然东西方军事对峙的冷战占主导地位，但是，经济外交、相互依存、综合国力等命题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不久，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以及“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把国际政治经济学推上了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心舞台，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制度、软实力、南北关系、全球化等名词不仅频频出现在研究者的论文中，而且出现在一般的新闻媒体之中，铺天盖地。国际政治经济学随之而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展，更是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全球治理格局变革、新兴经济体崛起、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多边贸易体系重组等等成为国际关系变化发展中众所瞩目的焦点。这些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引和新的研究方法。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是国际关系理论界义不容辞的使命。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本权威经典教材，既能作为高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本科教学用书，也能作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研究参考书。

社区治理与中国政治的边际革新

刘春荣 专著



本书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的社区治理经验，研究我国基层社会的微观结构与变迁，探讨中国城市基层政治的性质、动力与影响。社会大转型以及城市治理体制改革所产生的交叉压力，促使基层政权的治理部门发展出新的组织形式和行动策略。这些组织行动的差异性和变异性，既根植于社区中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也取决于行动者的能动性。激励并包容具有制度生产力的基层策略行动空间，正是中国政治体系实现边际革新的基础条件。

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实践与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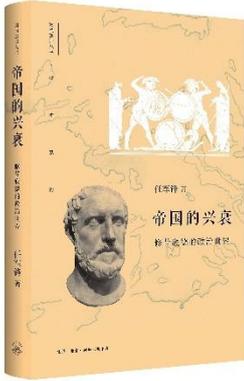
秦倩



本书通过调查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宗教非政府组织组织，比如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台湾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中国基督教两会社会服务部等，结合中国民法、行政法领域有关的法律规范和行政命令，在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分析了中国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实践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推动下，除了先期就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宗教类团体外，中国社会开始陆续有宗教团体或者宗教界人士以及信教群众利用中国现行规范非政府组织的法规范体系成立非政府组织进行慈善公益领域，从事各种宗教社会服务事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恰好彰显了当代中国宗教界的“社会性”呈现，以及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发展非政府组织模式以及宗教非政府组织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所面临的主要政策障碍。

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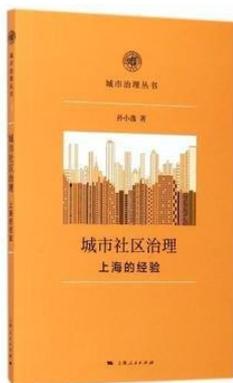
任军锋 专著



一位 2500 年前的人物，其著述围绕的是发生在 2500 年前的一场战争。他以及他笔下的那场战争与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他能够给后人尤其是生活在 21 世纪的中国人提供怎样的启示？本书力图 and 读者一起，努力进入修昔底德的精神世界，理解修昔底德的政治教诲，通过对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的描绘展现出，古希腊绝非人类精神史上的初级阶段，而是一座后世无法逾越的精神巅峰。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双峰并立，他关于人类政治事务的思考深沉委婉且入木三分。作为“复旦通识丛书”中的一本，本书也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本书的写作也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并给出了作者独到的解答：雅典帝国的兴衰无疑是修昔底德著述的核心关切，而这一兴衰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力机制？雅典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去世后发生了怎样的反转？以自由、民主、文明、开放著称的雅典，最终却败给了被认为是寡头统治、封闭、保守且在经济上相对拮据的斯巴达？在揭示古希腊人的基本政治处境的同时，一窥其对人类政治事务的深邃思考，想必会对读者深入理解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有所裨益。

城市社区治理：上海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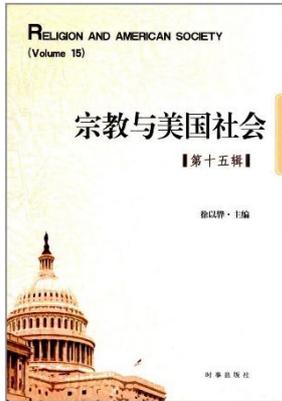
孙小逸 专著



孙小逸著的《城市社区治理：上海的经验》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剖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行动者的空间想象与实践；社区空间内的权力结构和治理逻辑；社区治理与城市政治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从而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和创新提供政策建议。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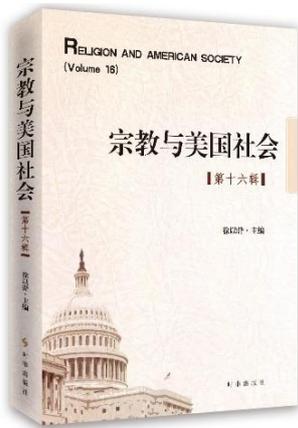
徐以骅 编著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的主旨是为促进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以及其他相关议题的研究。鉴于宗教在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重要性,研究美国宗教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美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同样鉴于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可以说宗教研究不仅是美国研究,而且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基础之一。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历史性、经常性和情感性因素,宗教对中美关系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议题。《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第15辑分为美国宗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史等三个部分。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六辑）

徐以骅 编著



《宗教与美国社会》系列丛书出版的主旨是为促进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以及其他相关议题的研究。鉴于宗教在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重要性,研究美国宗教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美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同样鉴于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可以说宗教研究不仅是美国研究,而且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基础之一。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历史性、经常性和情感性因素,宗教对中美关系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议题。徐以骅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6辑)》分为美国宗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史三个部分。

全球资本下的社区治理

朱春奎 合译



《全球资本下的社区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的转型，以及新城市政治的出现；美国集体所有制与社区控制的历史渊源；集体所有制的实践与现实，探讨了集体所有制在实现地方对生产、再生产和交换的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地方政治、地方自治和社会转型等问题。作者强调了集体所有制的潜力与缺陷，以期在资本流动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与发展

左才 专著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与发展》聚焦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主要争论、共识以及最新发展，将权衡观贯穿于对每一种方法的讨论中，并试图回答：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及局限性何在，研究目的如何影响研究设计？研究问题的因果类型如何影响案例选择？《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与发展》从研究设计的视角出发，涉及如下议题与方法：因果关系类型，概念化与操作化、案例分析与案例选择、过程追踪、人类学方法、社会调查法、实验与类实验方法。

国际政治系

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

黄河

《国际观察》(CSSCI) 2017 年 06 期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并没有逆转,而是面临转型。实际上,跨国公司嵌入式的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的供应链系统具有阻止全球化逆转的棘轮效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拓展,跨国公司的生产已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要素禀赋,对他国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由于其全球供应链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极易受到各种传统和非传统风险的威胁。这些威胁恰好属于全球治理所涉及的领域。在全球化转型时期,随着公司间联系日益密切、资金日益充足,以及其它非营利组织的不断涌现,跨国公司已在全球很多地区逐渐发挥了“影子政权”的功能,即为公众提供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为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融资方面,跨国公司与部分国际组织管理的信托基金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从理论上讲,自愿融资的激励会产生某种类似俱乐部的结构,可以促使跨国公司通过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模式构想

郑宇

《世界经济与政治》(CSSCI) 2017 年第 8 期

自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援助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效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作者检测了 1960—2013 年间官方发展援助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援助有效性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新型发展模式构想,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在定义上用更包容的发展合作融资概念代替官方发展援助概念,强调多源性、互惠性、自主性。第二,在理念上明确发展途径的多样性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化。第三,在实施上利用援助、贸易、投资这三驾马车,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开放式的工业化,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个构想不仅可以整合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模式,同时突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发展合作中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厘清南南合作中的模糊概念,为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改革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

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标准及其对金砖银行制度建设的启示

朱杰进

《国际观察》(CSSCI) 2017 年第 4 期

本文系统考察了世界银行反腐败标准的形成过程及其对金砖银行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启示,认为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政策经历了一个重要变迁,而后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世界银行主要捐款国对本国反腐败议题的重视。自世行成立以来,治理和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其不愿触及的“政治禁区”,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尤其是在沃尔芬森和沃尔福威茨两任行长的推动下,世界银行日益关注借款国的国内治理和反腐败状况,并将之作为其提供贷款的重要条件,事实上,这与美欧日等主要股东国在世纪之交高度重视国内的反腐败议题以及世界银行自身以股东国导向为准的制度特征密切相关。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创立的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更多地强调借款国主导和采用国别体系,充分体现借款国自身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因而应该采用一套更为灵活多样、更符合借款国实际的治理与反腐败标准。

Toward Generalized Evolutionism: Beyond “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Its Critics

唐世平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SSCI) 2017 年 9 月

This article seeks to transcend the debate regarding “generalized Darwinism” or “universal Darwinis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Highlighting recent discoverie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t is no longer tenable to insist that (neo-)Darwinism is the only proper doctrine for understanding biological evolution. Moreover, social evolution is much more than purely (neo-)Darwinian or (neo-)Lamarckian. As such, the debate on whether we deploy only (neo-)Darwinism or (neo-)Lamarckism — generalized or not — to understand social evolution is a red herring. Instead, social scientists should embrace “generalized evolutionism,” a more accommodating and versatile doctrine that subsumes “(generalized) Darwinism” or “(generalized) Lamarckism.” Empirical inquiries that deploy “generalized evolutionism” have shed important new light on some critical puzzles in human society: from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1500 AD, through the com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ore empirical efforts along this line of theorizing are needed.

Privatization with ‘vested interests’ in China

郑宇

《Socio-Economic Review》(SSCI) 2017年7月

Vested interests have been blamed for resist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n China. Yet,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have heterogeneous interests in privatization. Using both firm- and provincial-level data, we find that SOE managers and local bureaucrats—two key players of privatization—have contingent, rather than vested, interests in privatization, depending partly on their poli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motivate SOE managers to privatize more state ownership while retaining managerial 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central connections discourage provincial leaders from using privatization to boost their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se results shed light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hina implements its economic reforms. With the increasing embeddedness and declining autonomy for policymakers, the once well-performing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s now face serious challenges as politically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can manipulate economic reforms for their own purposes rather tha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政治学系

干部选任:关键环节及其关键问题

桑玉成

《探索与争鸣》(CSSCI) 2017 年 11 期

干部制度虽然在一国政治制度中起到了内核的作用,但干部选任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在我国尚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以破解。对新时期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提出我国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方向和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必要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来认识干部以及干部选任制度问题。其次,应当确立干部选任制度的问题意识。再次,要规范干部分类管理、干部选任的初始提名以及干部条件和标准的衡量把握等关键问题。最后,还应当注意在以下方面发展和完善干部选任制度:一是切实加强对干部选任制度的研究;二是切实重视干部分类管理的意义;三是改变选任干部的重形式条件而轻实质条件的状况;四是尽快制定选任干部的“初始提名权制度”;五是推动从“以官选官、以人选人”模式到“以制度选人、以程序选人”模式的转变。

关于世界观表现形式的若干问题辨析

邱柏生

《思想理论教育》(CSSCI) 2017 年 09 期

面对着世界观教育遭遇的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世界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认识到世界观表现形态的多样化和具体化。而要说明世界观,就要说明它的前提即世界的内涵是什么。如果将世界理解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两部分,那么世界观也可以具体界分成有关客观世界的观与有关主观世界的观。马克思主义看待与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坚持个别、特殊、普遍三者相统一。同样,我们在认识世界观表现的丰富形态上,实际上也可以将世界观看成有个别、特殊和普遍三种基本形态。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将世界观看作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所以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开掘不够,使得人们容易沉溺于即物主义甚至深陷物欲之中,对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性问题几乎忽视。这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意义所在。

三重政治经济失衡与全球化的未来

包刚升

《探索与争鸣》(CSSCI) 2017年07期

2016年以来,世界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频现。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全球化不仅是指经济全球化,而且是指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但三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潜在的冲突。从历史经验来看,人类自19世纪以来曾经历过三次全球化浪潮和一次全球化退潮。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是全球化退潮的主要原因;反之,全球化就处在稳步的上升过程之中。对于21世纪的全球化来说,主要挑战来自于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导致的经济失衡、政治失衡与政治-经济失衡。简而言之,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融合与政治分歧之间的平衡关系,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

参与式预算技术环节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中国地方参与式预算的跨案例比较

韩福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CSSCI) 2017年05期

公共预算的合法性问题取决于预算决策中的参与技术环节所形成的预算正当性的社会认同,它与后续的预算执行的有效性构成了两个核心支撑点。文章从参与式预算的具体技术环节入手,通过比较上海市浦兴路街道的“自治金协商民意测验分配”与云南省盐津县的“群众参与预算”等案例样本,分析了预算参与代表的选取方法,参与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技术,以及预算的表决方式的差异。通过比较发现,中国预算改革并不在于预算总量的增加幅度,而是预算的分配如何通过民主参与的技术供给和科学的程序设计,使得民众有机会参与到预算决策当中,从而增强预算的正当性,同时,中国参与式预算中民众参与的一个意义在于“民意可能激活代议制审查功能”。

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程序与效能检验——浙江温岭参与式 公共预算的制度分析

韩福国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 2017年05期

协商民主是一种有效的民意征集和利益整合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通过观察协商民主在浙江温岭市15年的实践程序发展,对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效能进行了实证分析。温岭协商民主从最初的公共事务的民主恳谈,到重大公共工程项目预算的协商民意调查,最后形成整个乡镇与市级部门的参与式预算,呈现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典型实验样本。在此基础上,对参与协商的样本科学性、协商前后参与人的态度变化、参与人地位与讨论团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性的效能检验,并对实践程序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归纳,分析了这一实践存在的问题。

从政府内部预算走向公共预算——筑牢法治、参与和技术的 “三角基石”

韩福国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5期

走向“公共预算”是中国预算改革和发展的时代必然,是改变传统政府内部预算结构化困境的需要。基于现代公共预算的制度需求,中国建立公共预算路径需要三个支撑性的“制度基石”——法治、参与和技术,它们发挥着中国预算制度转型的关键作用。法治是现代公共预算得以成为“公共”而不是传统的政府内部预算的关键制度支撑,公民参与是现代公共预算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具有现代政治参与的内在需求,也具有中国特定的社会积极性,可以保障公共预算的民主性和社会认同。现代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技术,可以让公共预算真正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提升现代预算执行的效率。因此,现代公共预算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制度,能否建构这一制度“三角基石”,关系到中国预算制度能否实现可能的转型。

腐败的两幅面孔:基于 7000 个司法裁判文书数据的描述分析

李辉

《理论与改革》(CSSCI 扩展版) 2017 年 05 期

本文基于 7000 余个法院判决书文本数据,从分布频次和涉案金额两个维度,比较了贪污和受贿两种典型腐败类型,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职位、以及个体和集体腐败五个方面的系统差异。研究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受贿案多于贪污案,而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贪污案多于受贿案;村委会和国有企业中贪污案多于受贿案;在其它 13 个监管领域中,都是受贿案占主要比例;两种腐败类型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官员之间并没有系统差异,总的来说都是贪污案多于受贿案;单位正职或者一把手,贪污和受贿的机会相当,但是单位副职受贿的机会远大于贪污,一般工作人员则贪污的机会大于受贿;最后,在个体腐败中主要是受贿行为,而集体腐败中主要是贪污行为。本研究对于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领域、以及不同职级和职务的官员,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性的反腐败策略提供了实证支持。

文化生产新空间中的传统文化再加工

——对二次元、网上文化社区与弘扬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

郑长忠

《中国青年研究》(CSSCI) 2017 年 09 期

在全球化、市场化与网络化背景下,以传播与创作“二次元”等文化产品为主要内容的青少年网上潮流文化社区发展成为不仅仅局限于“二次元”文化产品的多种类型的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文化生产新空间,如哔哩哔哩(“B 站”)等。这些文化生产新空间由于自身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与全球化、市场化以及网络化的时代背景相契合,成为文化建设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空间。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条件之一,在新时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来弘扬传统文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个战略性任务。基于文化生产新空间的特征,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在文化生产新空间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加工,从而达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目的,但是,由于历史性与现实性等因素,实现这一目的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与问题,需要我们从多个维度予以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化的新趋势

曾庆捷

《探索与争鸣》(CSSCI) 2017 年 11 期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人对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力图克服选任工作中存在的不正之风。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十八大之后选任工作中的新动态、新举措,可以发现,中共干部选任体制总体上是朝着权威非人格化、操作流程细化、自由裁量权减小等官僚制特征的方向发展的。同时,由于规则程序的可操作性问题以及中共领导人对客观程序的消极后果的感知,干部选任工作中也存在着与理想型官僚制相背离的因素。

Cadre rotation and campaign mobilization in China's anticorruption enforcement

曾庆捷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SSCI) 2017 年 8 月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are fundamentally mechanisms of controlling agents at various levels. To do this, the principal can either rely on routine bureaucratic management or resort to ad hoc, intense mobilization to discipline its agents. Using China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ich mode of top-down control exerts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pattern of anticorruption enforcement. We focus on the cadre rotation system as an example of routine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examine its effects on provincial level enforcement. We also investigate how provinces respond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eriodic call to intensify anticorruption efforts. Based on provincial enforcement data from 1998 to 2013, ou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rotated officials has little impact on enforcement outcomes. Rather, the vigor of enforcement in the provinces responds strongly to national policy priorities, suggesting a highly centralized disciplinary system. Moreover, provinces of greater political importance are under more central pressure to conform. The findings challenge the often-made argument that stable institutions are effective in fostering top-down control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suggest that campaign mobilization continues to be an essential instrument at the dictator's dispos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s NGO intervention: turning migrant children in Shanghai into "new citizens"

熊易寒

《Citizenship Studies》(SSCI) 2017年7月

Given the rapidly increasing presence of poor and low-income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ese metropolises, som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have shifted their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rom material assistance ('spreading kindness') to value and capacity building ('building new citizens').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data from an ongoing, longitudinal study (2007–2016) of migrant children in Shanghai, this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itiated by a domestic NGO, Changban Volunteer Center (a pseudonym), which seeks to instil such children a set of civic virtues to foster their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ultidimensional citizenship is employed to tackle the identity challenges faced by migrant children in dealing with multifaceted identities attached to urban, rural and global setting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etical debate on interventions by educational NGOs, in particular how they perceive and implement citizenship education for disadvantaged internal migrants. It further considers the potential of this type of informal education to help cultivate citizenship-related attitudes and capacities and to address the educational exclusion of migrant children.

公共行政

Dual Ident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Contracting in Shanghai

敬义嘉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SSCI) 2017年10月

Chinese governments, driven by both pragmatic and legitimacy purposes, have been enthusiastically engag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ervice contracting to meet rising service demand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contracting is shaped by their dual identity as state agents and social actors. Such a dual identity is forged by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ts internal tension may create both incentives and disincentives for contracting.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for the social service program in Shanghai (2009–2013), the article finds intriguing evidence that both identities ha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participated to demonstrate loyalty and manage their relations with government, as well as to seek new resources, social vi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apacities. They reconciled the two identities by adopting multiple strategie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how contracting has been adapted to the social-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China.

当代中国财政权的控权机制设计及其实现路径

唐亚林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CSSCI) 2017年05期

现代组织三大权力要素是由用人权、财政权与治事权构成,而财政权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权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建构现代国家治理的形象、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效突破口以及形成中国国家治理的权力三分与监督新范式等作用。当代中国财政权改革的总体部署可以用“一个总纲、一个方案、一个指导意见”来概括,其主线是围绕建立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财政权而展开的,其控权机制改革实践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为先导,构建公开透明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权责对等机制、立法保障机制等。当代中国财

政权控权机制设计的战略安排的核心是理顺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三者的关系,即发挥政党的“方向性作用”、人大的“审查性作用”、政府的“绩效性作用”的“三位一体”作用。在控权机制设计的路径选择方面,走制度化统率渐进化、分层化与立体化的改革路径,开创通过控制财政权来带动整体性权力制约的中国式权力制约新路。

使命-责任体制:中国共产党新型政治形态建构论纲

唐亚林

《南京社会科学》(CSSCI) 2017 年 07 期

回答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这一根本问题,是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发展中国的一大基本前提。从性质、作用、角色、地位、使命、责任六大比较内容出发,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和平共荣的使命型政党,其正致力于建构的“使命-责任体制”新型政治形态包括国内“全国一盘棋思想”和国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两大战略内涵,这两大战略内涵的实现机制有赖于以德治党与依法治国相互促进机制以及决策-执行高效互动机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面生成,从而在战略与机制层面塑造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更新双重内生动力机制,型构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转化为生动历史实践的制度化动力。

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科研发展评估:基于深圳的实证分析

唐莉

《公共行政评论》(CSSCI) 2017 年 06 期

在知识经济崛起的今天,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正成为世界各国及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科技创新长期保持着迅猛发展的势头。深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从更高层次上对基础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深圳基础创新能力的研究并不多,对其基础研究发展的实证分析更是罕见。为填补这一空白,论文以“定量开路、工具辅助”的研究方法,从科研产出、基础创新能力、科研国际影响力三个视角对深圳基础科研与创新的现状及动态进行分析,并结合深圳实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公共数据开放的产出与效果研究——以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为例

郑磊

《电子政务》(CSSCI 扩展版) 2017 年 09 期

公共数据开放之后有哪些利用者?开放数据是如何被利用的?带来了什么产出和效果?以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为例,对开放数据的利用者、利用程度、受益者、利用产出和效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后能吸引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数据利用者。数据利用者们对比赛专门开放数据、政府开放数据平台上常态开放的数据都有较高程度的利用,并将这些数据和各类自带数据进行了融合利用。基于开放数据产生的创新应用形式多样,应用领域广泛,潜在受益者包括普通市民、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公共数据开放具有巨大的潜在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

开放政府数据准备度评估:法律法规与政策

郑磊

《电子政务》(CSSCI 扩展版) 2017 年 09 期

对与开放政府数据准备度相关的国际评估报告和研究报告进行了综述,确定了开放政府数据准备度评估的基本框架。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重点对法律法规、政策两个层面的准备度评估指标进行了细化。在此基础上,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中国 8 个地方政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的开放数据准备度进行了初步评估和分析。

政府数据开放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郑磊

《电子政务》(CSSCI 扩展版) 2017 年 09 期

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已经得到各级政府的普遍关注,不少政府尝试通过法规政策、数据大赛等多种手段促进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进程。然而,由于政府数据开放中的潜在风险,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数据开放中存在担忧,导致当前各级政府的数据开放工作进展缓慢。以上海市为例,通过对部分委办局展开深度调研,分析政府数据开放中的潜在风险并提出对策,以期为中国政府的数据开放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数据分析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危机治理与政策传播研究

刘淑华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CSSCI 集刊) 2017 年 01 期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与广泛应用,对以传统媒体为主要媒介的传统危机治理与政策传播方式构成了挑战。本研究选取天津爆炸事件,对官微进行数据挖掘,并结合案例与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阐述政府是如何应用社交媒体进行危机治理与政策传播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危机信息传播呈现不同的特征,在传播过程中三大节点群体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地方政府在政策解读等环节缺乏及时的政府回应,面临如何准确地对传播效果进行感知和评估等挑战。

“政策之窗”的关闭与重启 ——基于劳教制度终结的经验研究

朱春奎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 2017 年第 9 期

劳教制度废止经历了两次“政策之窗”,第一次因终结阻力过大而“关闭”,第二次成功突破阻力,劳教制度正式废止。两次“窗口”期间,问题源流中问题焦点由制度法理缺陷转变为权力严重滥用,政策源流中倡导联盟由分歧走向共识,政治源流中法治理念由初步确立到全面推行,公众舆论由话题讨论到高度聚焦,政策企业家群体迅速壮大、“软化”方式更加多元,“唐慧案”的触发与高层领导人换届相结合,劳教制度成功废止。议程设置的演化逻辑与多源流理论保持较高一致性,再次验证了该理论对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解释力。两次“政策窗口”之间所发生的终结推动力与终结阻力的对抗、联盟间的政策学习还展现出多源流理论、政策终结理论与倡议联盟框架等政策变迁理论之间的契合点与对话空间。议程设置过程中呈现出的“溢出效应”的功能与实现、“政策之窗”的关闭与重启、倡议联盟、政策学习与议程设置、政策企业家的类型及其影响等特征为人们理解当代中国法制变迁的政策过程带来了新的理论启示。

编辑: 陈相君

审核: 敬义嘉